

读书

乔晞华

作者乔晞华为美国图兰大学社会学博士，著有《文革群众运动的动员、分裂和灭亡》、《总统制造：美国大选》等作品

中国民主季刊

第4卷 第2期

2026年04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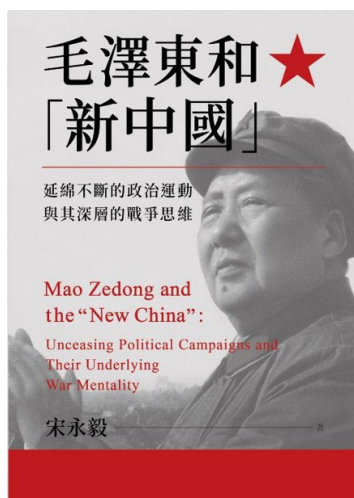
CC-BY-NC-ND

自由、免费转载分发，但须注明
作者与出处，并不得修改及商用

中共政治运动研究的新视角：宋永毅《毛泽东和“新中国”》

题记：宋永毅教授的新著系统梳理了毛泽东运动治国的内在逻辑。目前中国和一些国家出现了类似毛泽东时代的政治运动，发生这种复归和演变，必定有其原因——答案或许就在这部著作之中。

2026年，正值文革爆发六十周年之际，宋永毅教授出版了新著《毛泽东和“新中国”：绵延不断的政治运动与其深层的战争思维》（以下简称《毛泽东和“新中国”》，引用只注页码）。这是他2021年出版《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政治心理和文化基因的新阐释》¹（以下简称《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后的又一力作。



台湾联经出版公司
2026年1月

宋永毅教授最广为人知的学术成就，是他数十年来对中共历史原始资料的搜集，不但享誉华人学界，而且闻名国际学界。《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标志着其研究转向另辟蹊径为文革研究提供全新的、极具启发性的视角。该书把心理文化方法运用于文革的宏大叙事，解释文革中的重大事件，解读决定文革进程的领袖与重要政治人物的思想和行为。该著作基于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文化、心理理论框架，体现了中国经验与西方学术背景的密切结合。特别是该书借鉴西方学者用精神病理学来研究政治人物的方法，在文革研究中独树一帜。

《毛泽东和“新中国”》与《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是姐妹篇，主要区

别是研究重点不再仅限于文革，而是文革前毛泽东发动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一般而言，学者们通常更注重研究某个地区、某个专题、某个政治运动²，这是因为许多大的运动或事件已经有太多研究了³。而在巨量的中共研究专著和毛时代中国政治研究专著中，对于政治运动的系统研究仍为空白。如今《毛泽东和“新中国”》就填补了这一空白（见吴国光教授“序”）。这是该著作最重要的学术意义。

《毛泽东和“新中国”》的第一个特点是，作者对中共政治运动所构筑的革命理论体系做了彻底的解构。作者不仅对中共的政治运动作了全景式的审视，还对其进行纵深面的剖析。例如，该著的第一章分析土地改革运动，不仅从理论上，更从具体的数据上颠覆了至今为止还在被极力吹嘘的革命神话。中共发动土改的主要理论依据是，中国存在一个延续了3000年之久的“封建地主制”。这一经济形态又表现为地权的超级集中和过量的地租。然而真相是：这种论调一出笼便遭到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批驳；在后毛时代，大陆学界的主流已经否定了所谓的“封建地主制”。学界的共识是，中国长期地少人多，并不存在一个“地主阶级”，所谓的“地主”不过是勤劳节俭的自耕农群体而已。中共的土地改革运动是建立在人为杜撰的封建地主制度和完全虚假的地权分配数据的基础上（页19-20）。

中共政治运动指导理论的荒谬性，不仅表现在它们全然依赖虚假数据支撑门面，还表现为其政策出尔反尔的欺骗性和蓄意制造敌人的残酷性。该著第三章论述中共建政初期发动的“镇反运动”和“肃反运动”。1949年初，毛泽东代表中共曾信誓旦旦地表示，任何前朝政府成员，只要不进行现行武装抵抗，不应当处决或关押。然而，1950年发动

的“镇反运动”中所杀的“反革命分子”，绝大多数并不是因为他们有现行抵抗活动，而仅仅是因为他们的历史身分。数以百万计的这些所谓“反革命”，大多数是中共背信弃义或官逼民反政策制造出来的。1955年开始的“肃反运动”是中共进一步在自己内部制造反革命。根据中共自己公布的肃反材料，仅有不到6%是反革命分子，而其余94%以上都是无辜的（页20-21）。

《毛泽东和“新中国”》的第二个特点是研究方法上的突破。研究中共的文献中，对于某个政治运动的研究并不少见，特别是对文革的研究，论文、论著浩如烟海。但是，此类研究往往把某一个政治运动作为一个或一组历史事件来对待，虽然也探讨其作为政治、社会、历史事件的源起、过程及其意义。《毛泽东和“新中国”》则从宏观着眼，把个案分析与相关历史脉络的深入探究相结合，并以政治运动作为总的研究主题综合讨论。这种从点到线、到面、再到立体的认识方式，具有系统与综合优势（页8）。

《毛泽东和“新中国”》的第三个特点是，在批判运动发动者和迫害者的历史罪责之同时，也对广大受害者的历史局限性予以毫不留情的揭示和剖析。例如，第二章谈及建政初期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一般人以为，中国知识分子是在中共的暴力逼迫下接受改造。但历史真相却是，中共刚进城，大批知识分子就主动投靠。当年知识分子曾主动选择中共“洗脑”。大规模的、举国性的知识分子检讨，是思想改造运动的一个特殊现象。当年中国精英阶层的上千份检讨，被新政权发表在全国性的报刊上，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公信力造成的损伤是不言而喻的（页22）。

同时，对中共强权的主动臣服，还表现在 1949 年民族资产阶级的选择上。中国的民族资本有过很多机会，转移资本到国际市场，或者在海外开拓新实业。但是他们多数人并没有选择流亡海外，而是留在大陆继续发展。他们以为改朝换代后的共产党会好过国民党。他们相信可以和共产党合作，以获得更大发展。中国的私营工商业主也选择相信中共。仅七年时间，中国的私营工商业就在“公私合营”旗号下灰飞烟灭。更为可悲的是，产业所有者们还要打着旗帜、陪着笑脸，违心地拥护共产党没收他们的私有财产（页 23）。真是引狼入室，自作自受。

按理说，中共建政后，本应该致力于经济建设，提高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可是，毛泽东却不断地发动名目繁多的政治运动。例如，以整人为目的的“镇反”、“三反五反”、“反右”，以领导人政治指标为指导的“人民公社”、“大跃进”，以思想教育为宗旨的“学雷锋”、“学解放军”等一系列政治运动。到毛晚年，文革更是登峰造极。可以说在毛时代，一个运动未息，一个运动又起，人人被运动裹挟，一切均在运动之中。

毛泽东一而再，再而三地发动政治运动，既基于其战争思维，也得益于其“克里斯玛型”（也称为“魅力型”）权威。韦伯定义“魅力”为“人格的某种特质，使某人显得与凡人不同，且被看作拥有超自然、超人或至少非凡能力或特性的人”。魅力型权威基于领袖“超凡的个人特质、神奇的洞见或成就，并吸引跟随者尽忠和服从”的权力⁴。因其权威独特而又缺乏组织性，魅力型权威很大程度依赖个人崇拜。随着时间推移，毛经验累积，对政治运动极其娴熟，深晓其奥秘。魅力型权威的

管治通常存在于威权国家、独裁国家和神权政体。当领袖死亡或离任，魅力型权威也就自然消亡⁵。

尽管毛发动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但基本上是失败的，这从运动的重复性上可以体现出来。毛发动“三反运动”以解决党内的贪污腐败问题，但是新的腐败问题却依然此起彼伏。毛不得不发动“新三反运动”来制止新的腐败。中共党内的“整风运动”从来没有停止过，但是党内风气却越整越坏。毛时代至少有过三次“三反运动”和两次“五反运动”。可是，这些不断重复的政治运动没有能够真正有效地解决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政治运动催生了民主呼声。1957年曾出现过中共建政后第一次组党结社高潮。在各个高校的右派集团里，有很多人产生了在中共和现有的民主党派以外，另行组建独立政党的想法。例如，清华大学的徐璋本教授和他的“中国劳动党”，云南数所大专院校的“中国大同党”，兰州大学右派学生筹备成立的“中国共产主义自由青年战斗联盟”。1966至1968年文革中大量涌现的造反组织中，也有不少带有追求民主的色彩⁶。

分析运动时，我们需要分清两种运动，即党的运动和群众运动。后者更严格地说应该叫做“社会运动”。中共发动的政治运动是自上而下的运动。中共在领导其运动的过程中，嘱咐下属不能简单包办，也不能放任民众自流，党的领导干部必须对政治运动倚靠的民众给予实际物质利益作诱因（页13）。实际上，历次政治运动都是在中共干部的幕后操纵下，通过中共严密的各层党组织驱使民众进行的。而真正的群

众运动（即社会运动）是自下而上的、自发的、矛头向上的运动⁷。

1976年“四·五运动”中，民众反抗敲响了文革丧钟。在毛去世后不久，文革便不得不草草收场。两年后，全国爆发了知青“大返城运动”，迫使中共中止了持续20多年的“上山下乡运动”。“大返城运动”是中共建政以后，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个民众赢得胜利的社会运动⁸。

2012年习近平执政后倒行逆施，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削弱集体领导与制度化约束；加强对媒体、互联网、学术与公民社会的监管；强调所谓的“共同富裕”，对企业加强控制，国进民退；对外关系上，采取强硬路线，不断制造国际摩擦，引发台海紧张局势。批评者认为习近平试图效仿毛泽东进行第二次文革，称之为“文革2.0”。既可惜又万幸的是（对中国人民来说），习近平本身相对平庸，并不具备堪与毛泽东媲美的魅力型权威，不可能也不敢像毛泽东那样放手让民众进行类似文革那样的群众运动。连毛泽东都玩火自焚，被其亲自动的文革所反噬，如果习近平敢步毛泽东后尘，必难逃失败下场。习近平缺乏威望，只能靠高压的铁腕手段，维持其不得人心的专制统治。

目前中国和一些国家出现了类似毛泽东时代的政治运动。发生这种复归和演变，必定有其原因。我们也许可以从宋永毅教授的新著作中找到启示。

注释.....

1 宋永毅，《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政治心理和文化基因的新阐释》。台湾：联经出版社，2021。

- 2 杰夫·古德温：《今日社会运动研究：一个局内人的（自我）批评》 [Goodwin, Jeff, "Social Movement Studies Today: An Insider's (self-)Critique" 2012. <http://politicsandprotest.ws.gc.cuny.edu/files/2012/07/Goodwin-Contemporary-Sociology-Essay.pdf>) 。
- 3 加布里埃尔·赫特兰、杰夫·古德温：《资本主义从社会运动研究中的奇异消失》 (Hetland, Gabriel and Jeff Goodwin, "The Strange Disappearance of Capitalism from Social Movement Studies." *Marxism and Social Movements*, eds., Colin Barker, Laurence Cox, John Krinsky, and Alf Nilsen. Leiden: Brill, 2013, pp 83-102.) 。
- 4 乔治·里泽尔：《社会学理论》 (Ritzer, George, *Sociological Theory*, 8th edition. McGraw-Hill, 2010.) 。
- 5 约翰·马奇奥尼斯：《社会学》 (Macionis, John, *Sociology*, 18th edition. Pearson, 2023.) 。
- 6 约书亚·张、菲利普·蒙特、詹姆斯·赖特：《文化大革命中群众运动的动员、派系分裂与覆灭：社会运动视角》 (Zhang, Joshua, Philip Monte and James Wright, *Mobilization, Factionalization and Destruction of Mass Movements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 Social Movement Perspective*. Remembering Publishing, 2020.) 。
- 7 乔晞华，《文革的暴力与造反运动：南外王金事件个案分析》，华忆出版社，2025。
- 8 约书亚·张、菲利普·蒙特：《被迫上山下乡的中国城市青年的苦难与抗争：量化研究》 (Zhang, Joshua and Philip Monte, *The Suffering and Resistance of the Chinese Urban Youths Forced to the Countryside: A Quantitative Approach*. De Gruyter Brill, 2026.) 。